



■海都记者
吴雪薇

作为寄托年轻学子希望,改变学子命运的社会大事,与高考相关的一切,每年都是社会热议的话题。做好后勤保障,护送学子平安高考,每个考生家庭与各相关部门每年也付出了许多心血。那么,面对改变命运的考试,古代的福建学子曾如何赶考,又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呢?高考今日开考,海都记者采访福建文史专家卢美松,还原历史上福建学子的科举路。

山高水长,唐代闽人赶考路难行

不比如今高考全国同步,考生走出家门,短则十几分钟,长则提前一到两日就能抵达考点附近,古人的科举考试,颇费周折。我们都知道,古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、会试与殿试。除了选拔举人的乡试在各省的省会考试之外,会试与殿试都需要赴京赶考。

科举考试起于隋代,但据福建文史专家卢美松介绍,中唐以前,福建的举子是很少赴京考试的。一方面是因为福建多山,路途遥远崎岖,从当时还是闽国的福州到都城长安,需要翻过重重高山,经浦城,过仙霞关入浙江,跋涉几千里,中间至少需要花费三个月,交通十分不便;即便走水路,唐代没有大船,只能乘坐小船沿岸航行,难避风浪,风险极大。李白曾言“蜀道难”,但其实闽道亦难。

另一方面,路途也花费甚巨,一人难行,需携带书童、仆人,旅途均是花费,非大户人家难以负担。唐代年年均有开科,一科不中,滞留京城以待明年,又是一笔巨大的花销。

另有文献显示,唐代科举录取名额稀少,且“公荐”占很大比例,由当时的朝堂大人物推荐,并考察“身(长相)、言(口才)、书(文章)、判(断案)”。福建地处偏远,交通不便,远离政治文化中心,一个福建人,想要在京城混个名声,同时通过科举考试,入仕为官,几乎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。因此,当时福建人在乡试中得举人,在本省官衙谋一个差事做,就是极好的了。

历史记载福建人第一次中得进士,是唐神龙二年(706)的福建长溪县(今福安)人薛令之。他在开元间累迁左补阙兼太子侍读,与我们耳熟能详的大诗人贺知章并侍东官,开启了福建在科举中出人头地、扬眉吐气的进程。但唐代公元618年—公元906年的近三百年间,福建的进士有记载的一共只有56名。

两宋全国进士2万多名 四分之一是福建人

时间来到了宋代,自公元960年北宋建立,至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,据《福建通志》记载,319年间,福建共走出了7043名进士,人数实现了百余倍的跨越式增长。相关文献显示,两宋全国共有进士28933名,算下来,福建人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左右。

从唐到宋,福建的进士人数能实现如此增长,与唐宋之际全国经济重心的转移有很大关系。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南方后,原来的边远弱省,人口涌入,得到开发,一跃跃升成为纳税大省。经济的增长,带动交通与人口流动的增长,使得教育的风气兴盛起来。

卢美松举例,经济贸易的发达,推动了中国第一种纸币,宋代“交子”的出现。携带“交子”出门,比携带银子、铜钱出门要更加方便。同时经济贸易的发达带动了驿站的增多,位于福州森林公园的小状元岭古道,就是宋代以来福建举子们进京赶考的驿道。他们从福州出发,经此条驿道过闽侯、古田水口、南平、建安、建阳,而后从浦城出省到达浙江,进而前往京城。京杭大运河交通的发达,与宋代大型海船的出现,也进一步促进了水路交通的便利。

明代全国唯一“七代进士家族”,来自莆田

宋代重视文人,最大限度放宽了科举应试者的资格限制,扩张了录取人数规模,从唐代一科不超过三十人的录取率,扩至一科三百至五百人,并对落榜生亦有鼓励。对于唐代的“公荐”制度,宋太祖认为其易“因缘挟私”,遂下令废止,全凭考试成绩录取。

而背山面海的福建,人多地少吃不饱,想要出人头地,唯有科举一途,形成了重教的民风。因此,福建科举有着全国最高的录取率,其中莆田下辖两个县的进士人数,竟是福州十邑所出进士人数的一半,共出进士两千余人。而明代全国有2000多个进士家族,福建一省占十分之一。最牛的是,全国唯一的“七代进士家族”,就在福建,是来自莆田的黄寿生家族。在200多年间,这个家族直系八代中,有三代中解元、七代中进士,家族奋斗的力量可见一斑。“地瘦栽松柏,家贫子读书”,偏远而险峻难行的土地,最终造就了福建人抓住机遇,自强不息的性格。这种性格既体现在商业贸易上,也体现在文化教育上。在宋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中,抓住时代机遇的福建人,最终缔造了“海滨邹鲁”的文化奇迹。

福建人的科举路,爱拼才会赢

从唐路艰难到宋科崛起



唐昊图

知多一点

原来科举考试也押题 古人备考花样多

北京青年报

在现代社会,人们会想尽各种花样来备考,以期取得一个理想成绩。其实,说起考前备考,古人可是颇有心得。

辅导班突击班 朱熹也把儿子送到名师门下

在古代,想要获得系统性和专业性的学习机会,也得报上一个“辅导班”或者“补习班”,那时辅导班和补习班不算少,甚至还有由官方出面专门设置的“官学”。所谓“官学”,就是由官府设立的公办学校。在先秦时期,统治者便设立官学了。

古代的官学相当于“公办辅导班”,不收取学费,其资金来源主要靠财政拨款,学生的待遇和就业前景都不错。然而,能去官学这样的最高学府上学可不容易。历朝历代,对于大学或者国子监的入学资格都有着严苛的规定。到了宋代,由于重文轻武,对于文化教育的需求极大提升。于是,“民办辅导班”兴起,一大批书院建立了起来。

比如,南宋学者吕祖谦所创建的丽泽书院就是一所名牌辅导班。该书院位于婺州(今浙江金华)。吕祖谦不仅是当时的名家,而且本就是进士出身,在朝为官多年。他还

曾邀请朱熹、张栻等著名大家来到书院讲学,书院师资力量强大,这么一来,这家辅导班吸引了天下众多学子前来学习。

吕祖谦的辅导班受欢迎的关键还在于,他的书院教习的内容,基本上都是应对当时科举考试的技巧。换言之就是专门应对考试的“应试班”。正因如此,当时的大儒朱熹,也将自己的儿子朱塾送到吕祖谦门下学习。

除了辅导班,在古代还有“考前突击班”。古代书院为了提升“中举率”,每当到了科举年份,也会大规模扩招,想方设法吸引优质生源。比如,康熙二十三年(1684),湖南巡抚丁思孔将优秀的生童集中到岳麓书院教授科举之学,而且“月辄一试,糊名而进”,每月都进行模拟考试。各地士子听说之后,纷至沓来:“远方学者闻风向往,虽远在江南闽浙,亦不惮重茧而至。”

买教材押考题 学霸白居易自己编教材

作为一名应试的考生,教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在古代,有些学霸能够自己为自己编辑教材,比如唐朝诗人白居易,就曾经自己编辑了《百道判》和《策林》两本教材。

不过,这些教材的编撰者,其出发点还是停留在为考生们提供考前参考。而到了明清时期,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广义上的科举教材主要是指各类经史图书,但到了明代,尤其是明代中后期,科举考试日趋程式化,而大部分读书人考试的目的性更加明确,于是,许多考生不再专注于钻研经书大义,而是开始揣摩时文答题技巧。所谓“时文”,即科举时代的应试的文章。加上当时出版业发达,从明代开始,科举教材就成了一门生意,一大批以考试为导向的科举教材涌现。

早在明朝前期的成化、弘治年间,科举考试用书就开始出现了,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教材当数《京华日抄》。这是成化年间杭州通判沈澄所刻的一部时文集,相当于“高考优秀作文选集”。此书一面世,深受士子欢迎,同类书籍也随之大量出现。到了明朝后期,科举考试类图书处于供销两旺的态势。

当时,全国的图书出版中心在福建建阳,建阳书坊所刊刻出版的图书当中,很大一部分是教材。

后来,书商们不满足于简单的编选,还会邀请各路名家对编选的文章进行点评和分析,帮助考生加强理解,提升八股文写作技巧。比如,明朝的《一房得士录》《阅艺随录》《程文选》等都是此类教材。